

新方志教科文艺类编纂的经验和反思

——以《福州市志（1995—2005）》为例

张 灵

提 要：《福州市志（1995—2005）》于2018年正式出版，这标志着福州自《三山志》《福州府志》而来的方志传统继续薪火相承。而这部书的编纂历程也已成为一段值得去思考的历史，从中探究哪些方法有效便捷，需要以某种形式将这些经验流传下去；也要反思有哪些部分难尽如人意，在未来应以何种办法来尝试解决困难。不断探究史志的编纂方法是一种肩负历史责任的态度，本文试以《福州市志（1995—2005）》教科文艺类的一些例子来探讨新方志编纂的经验和思考。

关键词：新方志 编纂 经验 反思

《福州市志（1995—2005）》于2004年启动编纂，2018年正式出版发行，历经14年，它的出版标志着福州市第二轮新方志编纂取得阶段性成果。1995—2005年是福州市发生波澜壮阔变化的改革开放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福州市的城市面貌、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一部志书来记录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一方面，新的时代赋予古老的方志体裁以新的活力，让方志在现代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现代经济社会的信息量从深度到广度都有爆炸式增长，人们使用方志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方志能否在保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做出适应发展的改变，所进行的改变尝试是否达到时代的要求，所取得的成果是否达到传统上权威性地方文献的标准，这些都有待时间检验。对这些进行探讨和反思，有利于我们今后在新方志编纂中少走弯路、多出佳绩，形成门类齐全、质量上乘、使用方便的地方志文献体系。现以《福州市志（1995—2005）》为例，探讨在编纂新方志教科文艺类中的经验和不足。

一 《福州市志（1995—2005）》中教科文艺类基本情况

《福州市志（1995—2005）》教科文艺类集中在第5册中，分为《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文化》《广播电视》《卫生》《体育》《旅游》8篇，共约80万字。其中，《社会科学》以补述的形式记录1980年以来福州市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变化，其余篇章皆是以续志形式严格记述1995—2005年的情况。

对比首轮《福州市志》，《福州市志（1995—2005）》在篇章结构上有着较明显的沿袭，其中，《教育》《体育》《广播电视》等篇章与首轮志书有着较强的延续性，而因为时限内资料不足以独立成篇等原因，首轮志书中部分独立篇章在第二轮志书中进行了归类合并，如《新闻出版》《语言民俗》《文物》归并到《文化》，《医药》并入《卫生》。第二轮志书中还新增《社会科学》，所以，从整体比例看，第二轮志书和首轮志书的沿袭、变化、新增的比例约为5:3:2，较好地体现了续志的框架和特色。

为了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福州市志（1995—2005）》在部分篇中特设“体制改革”章节，如《科学技术》中的“科技体制改革与管理”，“文化”中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机构管理”，《卫生》中的“卫生体制改革”，这种将改革内容集中起来的思路既体现了一段时期内方志人对

地方志如何反应时代特色的思考,也是方志如何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记录的进行记录的尝试。总之,如此凸显的“体制改革”记述已成为《福州市志(1995—2005)》的一大特色。

二 《福州市志(1995—2005)》中教科文艺类编纂的成功经验

《福州市志(1995—2005)》启动编纂较早,和首轮《福州市志》有着比较好的衔接,大部分志编纂人员都参加过首轮修。所以,很多首轮《福州市志》行之有效的经验得以沿用下来。随着编纂的深入,面对之前未遇的问题,编纂人员尝试创新,用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上级指导思想的变化、编纂人员的调整、资料征集遇到的问题,使得编纂中需要用新的思路来面对困难、化解矛盾,从而形成第二轮方志编修的新经验。可以说,大批第二轮志书的成功出版既表现了新方志编纂,特别是首轮综合志书编纂的经验依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也说明方志编纂人员在处理难题时应变的机敏和用功的踏实,其中的经验是今后我们从事方志编纂的重要财富。

(一) 分篇主编在资料征集、篇章编纂中的核心作用。志书的门类包罗万象,即便进行分册编纂,每一册所包含的大门类也至少有10个左右,要求各册主编拥有如此全面系统的专业知识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每一篇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负责人员。而这个分篇主编对该项事业发展的掌握程度、对全盘资料的理解水平、对关键节点的认知深度,往往决定该篇编纂成果的水平高下。现以《福州市志(1995—2005)》中《教育》《社会科学》两篇为例说明分篇主编的重要性。

《教育》主编为教育局退休老同志,常年主持《福州教育年鉴》编纂,并参加过首轮《福州市志》编纂,对福州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所拥有的资料有着明晰的理解,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有条理地开展《教育》编修。而《社会科学》主体内容是由社科院组成班子编写,负责人为该单位办公室主任,因人事变动而多次调整,资料掌握起伏极大,一方面提出“需要收集(社会科学)的八个专业方面材料”,另一方面却只能编纂出一个方面材料,形成了较大的落差。所以,虽然《社会科学》编写团队在规模和行政级别上都优于《教育》,但因主编对资料掌握、方志体例熟悉等方面存在差距,最终成文的《教育》远优于《社会科学》。

而且,对该项事业足够熟悉的主编在编纂中更有定力,能够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在2010年《福州市志(1995—2005)》篇目重新调整的过程中,面对上级业务部门一些修改意见,《教育》《文化》的主编能够有理有据地反映问题,从实际出发进行篇目调整;而《社会科学》《科学技术》虽然由行政领导负责,但因不够熟悉资料,对篇目大规模调整所需的材料支撑不甚了解,导致篇目调整后无法组织相关篇章的编纂,后来不得不将篇目反复修改调整,编纂进度、质量都受到一定影响。

笔者认为,《福州市志(1995—2005)》的编纂再次印证新方志编纂中广受认同的分篇主编的重要性,该主编人员选择的适当与否决定了该篇成败的一半,其最需要的核心能力是对该项事业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非常熟悉,这项能力决定了该主编在编纂中的站位高度、框架设计、资源分配、材料收集渠道、对时限的把握,以及在编纂中遇到难题时的应变和适当的择善固守。这些能力应作为分篇主编的最优先级考量,也是其最难以替代的价值。这个经验有理由在今后的专业志书、部门志书、乡镇村志和将来的第三轮修志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二) 资料长编的支撑作用。资料长编作为新方志编修前的最重要资料准备,在首轮《福州市志》编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福州市志(1995—2005)》编写前,因各种原因未形成全书的资料长编,而是由不同篇章的负责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需要编纂资料长编。参考最后的修志成果,可以看出有无资料长编对志书的质量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现试以《文化》和《科学技术》为例阐述资料长编的作用。

《文化》的主体部分由文化局一位参加过首轮修志的年轻同志负责，他先编纂资料长编，后逐步修改，交出初稿相对较晚，但成稿后，质量过硬，历次评稿会上均未有大的修改意见。《科学技术》则未编纂资料长编，由各业务部门分块提交材料，再根据篇目进行拼接，初稿形成较快，但因质量参差不齐，在多次评稿会上均受到较多批评，最后的成稿亦不尽如人意。

由此可见，资料长编在目前的综合志书编纂中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相当于志书编纂的“龙骨”。将资料长编做好，即便在今后编纂中出现一定反复，也能够较合理迅速地解决。而没有资料长编的志稿很可能因为篇目调整、资料征集困难等原因骤然塌陷，既容易把志书编纂拖进“马拉松”的进程，也可能使最后的成书质量大打折扣。所以，方志工作者对资料长编这个修志“利器”，不仅应该稳持在手，更要时时拂拭、勿惹尘埃。

（三）扁平化管理，众手成志。《福州市志（1995—2005）》与首轮《福州市志》相比有个重大特点，即行政机关不全面掌握资料的社会事业大大增加，如物流、证券、楼宇经济、民间文艺市场等，用传统的行政主导方式收集资料比较困难。为应对这些问题，福州市绕开传统的行政方式，采用直接带领编写组的方式，进行扁平化管理，集中资源在较短时间内解决部分瓶颈问题。

《文化》中的“新闻出版”章，原定为独立篇，后因机构改革等原因出现档案资料流失和无人负责志书编纂的局面。针对该情况，福州市成立专题编写组，将初步形成的一些稿件和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汇集，并要求新成立的文新局补充资料进行编纂。根据统合的资料情况实事求是地将其降为一个章，相对顺利地完成了该项事业的史料编纂工作。《科学技术》的“科技研究”部分，在评稿会上被指出多处不足，福州市集合方志编纂专家和相关研究机构人员，以编写组的形式重新开展该章撰写，将工作推进了一大步。《大事记》中教科文卫内容，原先是对逐月政府公报进行剪辑，评稿会上提出其中有较多内容缺失，福州市将报社、档案局、方志系统的人员混合成一个工作组，专门进行大事记摘抄，比较迅速、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外，福州市还在总评意见修订、全书结构平衡、清除文本硬伤的过程中多次组织工作小组，取得了一定成果，推进了《福州市志（1995—2005）》编纂出版。

总体上，《福州市志（1995—2005）》编纂中的扁平化管理还是出于对强时限任务、瓶颈问题的应急反应，不是常态化的形式。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更主动、更规范、更有规律地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方志编纂。因为该形式的灵活和机动相对于传统的行政主导，更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无论是资料征集、初稿编纂，还是全书复核，都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质量。所以，众手成志不仅是一个有效的经验，更是一个可以开拓的方向，不断探寻其应用领域和使用方式，从实际出发加以推广，将极大推动地方志工作在现今社会中获取资源和开展成果转化。

（四）服务外包的初步尝试。在《福州市志（1995—2005）》编纂中，出现很多需要由非体制内专业人士来全面负责的章节。不同于先前的延聘专家，此一方式是地方志工作机构和专业人士通过契约建立关系，以明确的合同规定对相关内容的完成时限、质量进行保障，并据此进行监督和追踪，保证了相应章节的质量和时效性。

如“民俗”节，通过固有渠道所收集的资料匮乏到几近于无的程度，后通过社会广泛征集，得到一些较为零碎的材料，且有大量是重复首轮《福州市志》的记载。有鉴于此，福州市开始寻求将此项目整体外包，先后与在榕高校、民间专家团队等开展合作商谈，后确定由参加过首轮修志的一位专家组织团队撰写，以半年时间完成该项任务。“地域特色文化”章，是修订篇目后新增的重要内容，内容庞杂、时限较紧，福州市也采用将整章外包给专家的方式完成编写。

外包的另一种形式是由承编单位对所编纂内容进行外包，“广播电视”是由福州市广电集团将全部编纂业务外包给一个专家团队，其中数名专家参加过首轮修志，在体例认识、资料理解等

方面都有较深功底,根据广电事业发展的情况,在体例结构上略作调整,以更适宜反映广电发展,其成稿在历次评稿会上均得到不错的评价。

《福州市志(1995—2005)》中运用服务外包的领域较小,采用的方式也相对单一。今后的地方志工作将面向变化更为快速的社会,将有更多采取服务外包的机会。不止在综合志书编纂领域,在方志馆建设、乡镇村志编纂、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均可以有更多方式的服务外包尝试,将其作为地方志的常态化工作之一,打开地方志与社会的接口,使信息流通更便捷、资源配置更合理、成果转化更有效。

三 《福州市志(1995—2005)》中教科文史类编纂的不足和反思

《福州市志(1995—2005)》的编纂经历了完全沿袭首轮《福州市志》→反映特色增订篇目→压缩篇幅等几种编纂指导设计,这些过程都在成文中留下了痕迹。因为旧有经济社会事业变迁、新兴事业体制不同、政府行政职能转变、档案制度变动等造成的新行业资料缺失、社会变化反映不足、全局性资料匮乏等问题也都存在于志书之中。还有编纂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对体例认识不透彻、编纂方法单一造成的遗憾也都一定程度上存在。整体上说,《福州市志(1995—2005)》记录了一个时代,而其本身也是时代的产品,镌刻上了时代的印章,它的成绩反映了福州市地方志事业所到达的高度,其不足也深刻地体现了福州市地方志编纂能力的内在缺陷,充分认识到不足之处和造成不足的原因,做好相关的完善,有助于理清思路,确定好行进的路线,为将来的地方志事业发展扫清障碍,使方志能够继续保有权威性地方文献的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多、更有价值的贡献。

(一) 编纂思路上厘清社会事业“大”“小”的关系。在《福州市志(1995—2005)》教科文史类的编纂中,始终困扰编纂者的一大问题是,究竟应反映全福州市的情况,亦或是承编单位所能掌握的情况,也就有了所谓“大社科”和“小社科”、“大体育”和“小体育”、“大科技”和“小科技”的争论和落差。

从基本原理上说,城市方志所载的社会事业需要是全市的总体情况,包括市属行政机关管辖的资料、国家和省级在榕部门的材料、民营社会事业的资料等。但由于目前的编纂体制依托于各个行政部门,分篇志稿中有着强烈的部门志痕迹,而民间资料收集存在较大困难,所以很多社会事业在编纂过程中就逐渐向部门掌握资料的“小”的方向发展。这种编纂思路上的“大”和编纂成果的“小”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全书各种缺陷的源头之一。

《福州市志(1995—2005)》的“科学技术”“社会科学”部分在框架搭建时,都着眼于“大”,特别是“社会科学”,意图补首轮志书之未述,开列了8个方面的清单进行资料征集,但在编纂开始后,发现大量高校资料汇编的断限和全省域统合方式很难与福州市的资料要求相吻合,而行政体系的限制又使其配合福州市重新梳理材料的意愿不高、难度极大。民间社科研究方面,因其自主性较高且档案资料保存意识较薄弱,很多材料只能呈现散乱的点,而无法连成脉络。于是,编纂工作一步一步地往后缩,退回到社科院本身掌握的材料。虽然同步不断修改篇目,然而“大帽子小脑袋”的局面却难以根本扭转,可以说一开始未能实事求是的编纂思路造成了“社会科学”编纂工作的事倍功半。

“科学技术”也走过了类似的路径,编纂思路是试图将福州市自主研发的科技、落户福州的新技术、产学研综合体的成果进行全景描摹。然而根据不完全估算,这些资料用来编写出一本《科学技术志》尚有富余,根本不是一个篇章所可以容纳的。而各企业和研究机构对全面介绍本身科技有一定保守态度,愿意做一些亮点宣传,但成系统介绍则基本是回避态度。所以回头看“科学技术”当初着眼如此“大”的范围是有些好高骛远,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回归到“小”,于是在结构、体例、数据应用、文本编写上都有着“大”与“小”的矛盾,虽历次修改而无法完全抹去。

由此可知,方志作为权威地情文献,追求全面反映的基础是实事求是,目前的行政体系、商业模式、资料系统不会因为方志编纂而进行彻底重构,所以方志编纂要根据这种情况脚踏实地开展工作。在最初的编纂思路设计上,要根据资料长编或初步资料估算,对篇章的“大”“小”进行定调,踮着脚尖能达到的“大”,可以责成编纂人员的工作努力;过分的、不可企及的“大”则会徒然消耗编纂资源,造成时间的拖沓和人力的浪费。编纂思路应该从“小”入手,从眼前的资料做起,尽可能往“大”的方向去努力,这样能够保持篇章结构的完整紧凑,容易形成完整脉络使得篇章不“垮”。《福州市志(1995—2005)》编纂思路在“大”“小”上的失误和错位,造成了部分篇章编纂的遗憾,总结反思这些教训,有助于提高今后方志编纂的进度和质量。

(二) 篇目结构上传承和创新的平衡。造成《福州市志(1995—2005)》编纂时间漫长和部分篇章散乱的一大原因是两次篇目制定上的变化幅度太大。2005年启动修志时的篇目,几乎沿袭首轮《福州市志》,除部分篇章降格外,全书71篇与首轮的差别率不到7%。而2010年,上级业务指导部门在“反映时代特色、地域特色”的指导思想下,全面修改了2005年篇目,下发的篇目与原篇目差别率达到70%以上,相当于将已经进入全书总纂的志稿推倒重来。后经编纂人员、承编单位的多次沟通,再对下发篇目进行调整,最终定稿的篇目与2005年篇目差别率仍在50%左右。经过3年的补充资料和总纂修改,大量创新篇章无法落实到资料,于是又往回修改,最后成书的篇目与2005年篇目相比,差别率已经不到20%,相当于走了一圈回到原点旁一厘米。而很多资料经过十余轮的分解、补充和重组,产生了大量的错漏和口径不一,于是又花了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重新梳理和文表校核。遗憾的是,因此而投入的海量人力和资源并没有给《福州市志(1995—2005)》带来根本上的创新和质量提高。

方志篇目是在不断变化中,明正德《福州府志》和清乾隆《福州府志》在“选举”“风土”等篇章中都有一定变化,民国方志更因为近代测绘、制图、统计等技术的引进而在篇目上产生了不小变动。所以说篇目设置是可以随着时代而进行创新和改变的,但要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掌握好平衡是需要站位高度和对地域情况熟悉程度的,沿袭太多见不到发展,改变太大则难以着手编纂。就《福州市志(1995—2005)》而言,紧接着首轮《福州市志》开展编纂,在市情并未发生颠覆性改变、编纂人员基本沿用的情况下,以70%的差别进行篇目设计调整显然幅度有些大。

地方综合志书20—30年编纂一次,笔者认为,25%左右的篇目创新度是个较有弹性的比例,既能够延续上一轮的历史记载,又能够体现所书年代的特色。这种创新比例越往基层越可以放大,较小的境域在20年间发生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更高。考虑到省级综合志书多为分册的《金融志》《审计志》《交通志》等集合的志书系统,不是统一篇目,地级市的综合志书实际上是整体篇目最大的志书,其稳定性需要比基层志书来得高。而全书资料长编能够在篇目制定中发挥指引性作用,哪些地方需要创新,哪些地方需要稳定都可以通过资料长编找到答案。

(三) 编纂体例上需要相应变通。新方志的横排书写体例极具个性,是让人一眼可以辨识为方志的特点。然而现代社会城市之大,综合志书所记载内容之庞杂,恐不是一种体例从头到尾就能显示完整和翔实的,可以在整体上保持新方志体例的基础上容纳一定变通,而非见到“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等就一棒子敲死。

其实,在旧志中即有纪事本末体的例子,《三山志》中记载占城王国宰相来福州温泉疗养,治愈疥疮,事后立两块越南文石碑以纪感谢,“占城遣其国相金氏婆罗来道里,不时,遍体疥疮,访而沐之,数日即瘳”^①。可以看出历史上方志对各种体例并无排斥之处。

^① 梁克家修纂:《三山志》,海风出版社,2000年点校本,第529页。

《福州市志（1995—2005）》教科文史类在初稿编纂中容纳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然而在多次评稿会上，通过一轮一轮“体例不符”的筛查，最终很多可以点睛的故事从志稿中消失。例如“教育”部分一位华侨捐资建校的故事被分解成一条条记录，“旅游”部分“陈氏五楼”的故事让位于建筑的描述，都让志书失去了不少生机和灵动。

在今后的教科文史类志书编纂上，不可避免的会遇上一些故事，如果完全摒弃，会让志书显得生硬和呆板，太多故事则会使志书偏离最根本的记述方式，如何在这之中找到平衡，很考验编纂者对方志的理解。把故事和典故作为“随文”“专记”有机地安排进严整划一的志书，能够让方志的可读性和亲和力都大大增加，从而为方志运用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四）对“反映特色”的再思考。《福州市志（1995—2005）》教科文史类编纂中着重强调要体现记述时段内的地域特色、时代特色，有些地方甚至篇篇有改革章、章章有改革节。这种带有机械式、运动式的“突显”方式，说明方志编纂从理论到实践上依然有相当大的局限，没有成熟的方法来充分征集、运用材料，不能通过正常的结构安排反映改革脉络和特色亮点，造成特色记述和志书编写在风格上的不协调。

这种“反映特色”方式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一是内容的割裂，对特色的突显常被泛化为在每一篇里都设体制改革章，如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等，使得原来相对完整的记述结构被破坏，部分内容被前置，著述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更有一些章节因为内容被抽出，导致本身材料缺陷，难以支撑原来的结构。二是为追求“特色点”，影响了志书的记述和断限。《福州市志（1995—2005）》对超下限材料严格不予采用，但是因时限内某项特色的内容不足以成篇成章，为了写到“特色点”，经常用“准备该项工作”“营造社会氛围”等托词突破时限。三是过于一致的“特色”反而抹平了各地方志的个性。在第二轮志书的时限内，全国都在进行体制改革和城市化建设，而各地又都将其作为重要特色进行突出记述，反而造成各地志书的千人一面。

笔者认为，真正的“反映特色”是要站在记述历史的高度，以足够广大的视角来审视特色，使之在著述中占有与其重要性相适应的分量。一个地方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所应考虑的不只是其在断限内的地位，更应该全面考察其在地方历史上的定位。“改革”在第二轮志书中的确是一个涉及面广、具有连续性的重大事项。但既然五口通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可以分解在各个篇章节目中正常记述，改革也不一定要在原有记述外独自成篇才能体现其重大和特别。历史的重大转折是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件来展示的，通过对篇目的编排和对史料的梳理便能够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全貌，不一定非得将“独立篇章”作为反映特色的必要成分。

方志学术的繁荣离不开相应的自由空间，允许各地以不同方式、不同认知来处理“反映特色”这样的共同目标，尽量减少指令性干预，命题作文写不出真正的特色。鲜活的特色不是一个被泛用的名词，或者固结成块的条框，而该是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故事、能勾起群众深沉回忆的史料、能让孩子们眼里产生憧憬的时代印记，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说方志的理论和实践在反映特色上取得了成功，才是真正将一个恢弘时代收录进所编写的志书中。

（五）对图照收集需先行。《福州市志（1995—2005）》教科文史类的图照收集还存在一些遗憾，很多重要事件和重点建筑没有拍摄较好的图片，大部分都是行政机关提供的工作图照，从镜头语言来看，美感和震撼力大大不如专业摄影。其中“旅游”“文化”“体育”部分若有一些高质量的图照来和内文相对照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然而最后的图照却不尽如人意，无法达到提升和烘托的效果。

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图照收集启动过迟，是在总纂稿基本定型后才开始图照收集，离断限的时间已过去7年，很多当时的照片已经散佚或因记录不全无法使用。二是认知上没有把图照当成志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断打磨文字的同时，没有打磨好图照，有些已进入最后筛选环节的图

片还是像素小到一经放大就出现方格。尽管在一开始就强调各册要按64码以上来配图，但最后没有一册可以达到要求。三是过分依赖承编单位的图照，而承编单位的图照又以其内部活动为主，往往寄来的光盘里都是图，能用的却没有两张。其实，通过社会渠道收集的图照往往质量较高，以《福州年鉴》编纂为例，每年图照向社会和专业摄影家征集的比例在50%以上，保持着相当高的质量，这条渠道完全可以在方志编纂中运用起来。

通过对《福州市志（1995—2005）》教科文卫类图照的收集和反思，解决的关键点集中在一个“早”字上，早启动、早铺开、早落实渠道、早审核补充，即在方志编纂尚未全面启动的阶段，就可以随着资料长编的编纂开展图照收集，有些是可以使用的图照，有些则是指向更好图照的线索。例如，在编纂资料长编中，得知某风景区建设是很有价值的信息，即可将能收集到的图照尽量收集，找到兼具最多要素的图照，再以此为线索找到此类图照中最有美感的。启动早也表示收集图照的时间离发生事件的时间更接近，会有更多尚存的图照可供选择，摄影者本人的记录、记忆也会更清晰，对图照说明文字的细节会更准确，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图照和更加完整的信息。目前，方志编纂中图照收集不存在机制上的阻碍，只要早动起来，多看、多筛选，就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图照，这也是快速提高现今方志偏修质量的一条捷径。

结 语

《福州市志（1995—2005）》作为记录福州2200多年文明史一部分的著述，已经进入福州市的史籍中，它将在今后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被一次次地检索、使用和拷问，其运用领域已不再局限于方志，将成为有助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献。而对其编纂过程的反思和总结将是福州市方志人的一大课题，如何将行之有效的经验与今后的福州市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能够解决一线实际问题的方法，如何把造成文献缺憾的诸多问题总结成让后来者能少走弯路的“手绘地图”，使今后的方志编纂更为顺畅，成果在前人肩膀上更进一步，这是参与第二轮方志编修工作者的一项历史责任。

从教科文卫类的编纂实践中，我们已知晓方志不是万能文体，有其专长和短板，并不适合记录非常专业的工艺流程，也不适合叙述复杂的管控程序，而是在以事系人、地理记载上有独到的优势。所以，在编纂思路上要扬长避短，将社会事业的“大”“小”定位清晰，使方志更能发挥所长。在篇目设计和编写体例上，要设定可以企及的目标，划定需要完成的时限，尽量在时代特点、历史记述、材料征集、资源边界之间达到动态平衡。新方志是历史典籍在今日的延续，需要有所固执的定力，也是面向群众的地情文献，需要与时俱进的从容，这之间的准衡就是方志编纂者日积月累的认知、经验、眼界和魄力。

在今后的方志编纂中，无论是通志、续志，还是专业志、特色地情书，都需要有快速向信息平台转化的模块化设计，主动参与到信息源竞争中。在形式上与最强大的媒体语言保持共进的节奏，在内容上保持传承千年的文化个性，这是古老方志体例在今天和未来获得活力的不二法门。为了能向这些目标迈进，就需要我们更好地从《福州市志（1995—2005）》的编纂过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把经验化为踏实、拾级而上，把反思作为动力，迎难而上、避危而行。千年之前，白鹿洞书院，朱熹邀请论敌陆九渊开讲后，对书院士子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学习这种谦恭开放的反思精神是今后方志能够不断前行的坚强保障。

（作者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本文责编：周 全